

# 当代中国的毛主义辩论<sup>①</sup>

——反思本杰明·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美)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撰 萧延中 译

(摘要) 习近平对毛泽东的频繁提及, 以及他自己对意识形态创新的主张, 引发了关于毛主义在当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的争论。这个讨论追溯处于冷战高峰期时关于毛主义自身意义的早期辩论。本文将重访这次早期辩论的场景, 并在其与当代相关性的视角上, 反思本杰明·史华慈与卡尔·魏特夫之间的这场争论。

(关键词) 毛主义; 习近平; 本杰明·史华慈; 卡尔·魏特夫; 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哈佛大学政府系亨利·罗索夫斯基讲座教授 (Henry Rosovsky Professor), 哈佛燕京学院院长。

在1921年成立100年之后, 中国共产党再次高调颂扬其最高领导人的意识形态贡献。2017年10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被写入党章, 这是自毛泽东(1945年)以来中共在职领导人首次获得[以个人为主要贡献者命名意识形态]的殊荣。与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有所不同, ……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毛主义的持续相关性成为当代观察家们需要考量的问题, 这一点毫不为奇。<sup>②</sup>

关于习近平之毛主义倾向的讨论让人想起了先前的一场辩论, 冷战期间曾发生过对毛主义本身之真实性和重要性的研究。在其1951年的著作《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sup>③</sup>中, 本杰明·史华慈将“毛主义”(Maoism)这一词汇引入英语学术界。追溯中

① 本文译自 Elizabeth Perry: *Debating Mao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lections on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In *The Asia-Pacific Journal*, Volume 19, Issue 1, Number 1 (Jan 01, 2021), pp. 1-11.

② 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毛泽东还重要吗?》, 载 Jennifer Rudolph 和 Michael Szonyi 编《中国问题对大国崛起的批判性洞察》,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8年, 第3章; Sebastian Heilmann 和 Elizabeth J. Perry 编《毛泽东之看不见的手: 中国适应性治理的政治基础》,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2011年。

③ 本杰明·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 剑桥: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51年。

国共产主义发展的早期历史，史华慈认为，毛主义的意识形态，其精髓是汲取具体政治斗争之经验教训的反映，而不是纯理论的衍生物。史华慈提出，毛主义是一种务实的革命战略，（在其初始阶段）嫁接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用的要素，尤其是把具有纪律性和科层功能的共产党，作为（onto）动员农民群众的基础。<sup>①</sup>

史华慈将中国共产党描述为“一群职业革命家精英，他们依靠农民的不满情绪而崛起”，毛泽东所关注的不是造成不满之“客观状况”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而是“那些最终承担起满足这些问题之责任人的思想、意图和抱负”。<sup>②</sup>换言之，史华慈采取了一种知识——政治——心理学的历史研究路径，将其精英人物置于战略斗争的世界中，而不是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之某种空洞无物（disembodied）的对话中。史华慈的主要资料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党的正式决议和其他文件，以及广泛的参与者和参与观察员的非正式信件和回忆录，这些文献包括中文、日文、俄文、德文和英文。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开始，到后来的共产党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史华慈展示了共产党的路线是如何随着当时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和最高领导人的偏好而反复变化的。只有在最后两章（第12章和13章）中，他才谈到了毛泽东的统治地位和他的革命战略。

虽然关于毛泽东的讨论仅占全书的15%不到，但史华慈将毛主义看作一种独特的战略意识形态，则引发了争议。史华慈指出，在1927年遭到国民党的镇压，切断共产党先前在上海工厂工人和其他工业城市的立足点之后，毛泽东发起的农村革命，被迫偏离了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规定。<sup>③</sup>中共从城市无产阶级转向乡村的农民，标志着“一种从未在理论上得到明确表述的异端行为的开始”<sup>④</sup>。按照史华慈的表述，毛主义起源于一个未被承认，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的背离苏联教条束缚的政治实践。然而，十年后，当抗日战争允许中共“把民族主义情绪与自身的政治目的紧密关联在一起”时，“共产党领导层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可能本身就源于民族主义感情”。其结果是，在战时延安“毛现在有足够自信在理论建构（theoretical formulation）的领域采取主动……意图证明中国的发展代表了一种独特而原创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sup>⑤</sup>

当下，史华慈的关于毛主义之起源和演化的讨论看来已成为基本常识和不争事实。但是，在其著作刚刚出版之时，情况远非如此。史华慈博士论文的论点是，毛泽东革命的秘诀（recipe）“并不是莫斯科事先计划好的，甚至违背了当时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莫斯科的正统教义”<sup>⑥</sup>，这一论点直接挑战了当时在美国学术界占主导地位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描绘成苏联复制品的“模式”。史华慈强调，作为一个独特意识形态的毛主义的意义，不仅与苏联官方宣传部门的公告相矛盾，而且它也质疑了许多强烈反苏学者的坚定信念。正如他所指出的，“正统的斯大林主义历史编纂学正在付出巨大的努力，将

① 本杰明·史华慈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189页。

② 本杰明·史华慈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199页、第1页。

③ Fabio Lanza 在他的《如何书写革命：Harold Isaacs, 〈中国革命的悲剧〉》一书的章节中讨论了这一事件。

④ 本杰明·史华慈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191页。

⑤ 本杰明·史华慈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201页。

⑥ 本杰明·史华慈 《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5页。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描述成斯大林自己之先见之明和精心策划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个神话被许多自认为是克里姆林宫最大敌人的人所接受，甚至坚持”<sup>①</sup>。

史华慈的观点引发了异议。<sup>②</sup>其中最尖刻的抨击来自卡尔·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撰写的一组系列文章。魏特夫是前德国共产党人，他逃离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成为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之直言不讳的高调批评者。魏特夫是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历史学教授，他在麦卡锡听证会（译注）上指责同为汉学家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对“丢失”中国持同情态度，而在这一领域声名狼藉。<sup>③</sup>在魏特夫看来，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翻版。他在任何意义上都拒绝毛泽东是位创新者的观点；坚持认为，中国革命经验的每一个战略行动和意识形态的理由都能在列宁主义中找到完整的依据。在魏特夫看来，无论是“毛主义”还是他的〔党内〕对立方，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说都“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独创性”。<sup>④</sup>

按照魏特夫的说法，毛泽东的革命只是俄国人精心设计和组织安排的结果。虽然史华慈也认为列宁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他不相信中国革命仅仅是对布尔什维克蓝图的附和性翻版。正如史华慈回应魏特夫时所说的那样：“当然，现在事实的确是，列宁为世界共产主义的所有的后续发展打开了大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列宁穿过了被他打开的所有的门，这也并不意味着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和中国的毛主义的所有孕育过程，都只是对列宁教导毫无麻烦的机械挪用。”<sup>⑤</sup>

冷战早期关于毛主义争论的意义，与其说是一场晦涩难懂的学术操练，不如说实际上是一场关于共产主义集团之未来的政治辩论。史华慈争辩说，中国的毛主义（如南斯拉夫的铁托主义一样）反映了背离俄国正统教义，在共产主义世界的裂缝中呈现源于截然不同的民族经验和伴随而来之“各种主义”的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教义的命运可能会对中国、南斯拉夫（原文如此）和苏联等相互并不直接隶属于对方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响。”<sup>⑥</sup>这是查尔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后来在《农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力量》一书中所阐述的一种先见之明。他认为，中国和南斯拉夫对苏联的抗拒，是它们在农民民族主义革命的支持下崛起的产物。<sup>⑦</sup>到1962年约翰逊此书出版时，中苏分裂已经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既成事实。

紧随其后，发生了令人不快的有关“丢失”中国（“loss” of China）的国会听证会，

---

① 本杰明·史华慈《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年，第5页。

② Peter S. H. Tang《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国》，纽约：普瑞爵出版社，1957年；Richard L. Walker《共产主义下的中国》，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5年；Richard L. Walker《持续的斗争：共产主义中国与自由世界》，纽约：雅典娜出版社，1958年；Franz H. Michael和George E. Taylor《现代世界中的远东》，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社，1956年。

③ 罗伯特·P·纽曼《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丢失”》，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34-335页。

④ 魏特夫《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地位：理论与现实》，《政治评论》第16卷第4期，第464页。

⑤ 史华慈《毛泽东的“独创性”》，《外交事务》第3卷第1号，第74-75页。

⑥ 史华慈《毛泽东的“独创性”》，《外交事务》第3卷第1号，第74-75页。

⑦ Chalmers A. Johnson《农民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力量：1937—1945年革命中国的出现》，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2年。

毛主义的争论反映了学术界和政策圈里的巨大分歧。<sup>①</sup> 魏特夫和其在华盛顿大学的同事们暗示，史华慈和其哈佛大学的同事们，在识别毛主义之另类的生存之路中，建构了 (constituted) 一个危险的阴谋——如果他们不是出于对毛主义表示同情的话——最起码也是对共产主义这一庞然大物抱有天真的幻想。在1960年《中国季刊》的创刊号中，魏特夫在其题为《毛主义的传说》的论文中，把哈佛学派称之为“毛主义集团”，并以一种类似阴谋论的口吻详细描述了毛主义与哈佛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我只想说的是，实际上，‘毛主义’理论最早是由费正清在1947年提出的，费正清教授是本杰明·史华慈的‘老师和导师’，史华慈在1951年创造了‘毛主义’这个词，并详细阐述了它的含义；费正清教授在《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文献》(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t) 一书的筹备和组织方面履行了编辑职责，这本书的具体编纂和撰写解释性导言的工作主要由史华慈和布兰特 (Conrad Brandt) 完成，并于1952年出版；并且费正清教授在1958年重申了‘毛主义’命题……。”<sup>②</sup>

即便在“大跃进”，苏联顾问突然撤出中国之后，魏特夫仍然认为，共产党可能会违背莫斯科意愿的说法是一种“虚构”(“fictitious”)。在魏特夫看来，声称中国另类的革命传统促进了民族主义独立的趋势，虽然表面上这是个学术问题，但却泄露了一个政治动机，即“这个被称为‘毛主义’的论点，在形式上是历史的，但在内容上则是政治的”<sup>③</sup>。魏特夫责难史华慈及其同道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学理[基础]和政治背景理解不足”，指控他们在编造了一个“‘毛主义’的传说”<sup>④</sup>。作为一位前共产主义者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成员，魏特夫摆出了一副充当学理仲裁人的架势。“《中国共产主义的历史文献》的作者们，在1951年至1952年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他们有足够的机会在随后的中国思想的研究中去纠正其错误。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不断重复他们的关键结论……基于对列宁思想的不充分复制……以及对毛之行为的失真的描述 (misrepresentation)。”<sup>⑤</sup>

魏特夫声称，史华慈及其同事的“错误观点”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它们暗中削弱了美国赢得冷战的决心。“它们的破坏性后果不仅限于对纯粹学术理解的影响。由于他们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强烈地影响了这个国家的舆论塑造者和政策制定者，从而阻碍了制定一项明确、一致和具有远见的政策来应对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在这个重要的方面，这些观点明显地损害了自由世界……自由世界的存亡岌岌可危。”<sup>⑥</sup>

---

① 关于魏特夫在听证会中的角色，请参阅 Stanley I. Kutler 《美国宗教裁判所：冷战中的正义与不公》，纽约：希尔和王出版社，1982年，第201页；Ellen Schrecker 《没有象牙塔：麦卡锡主义和大学》，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165页。

② 魏特夫 《毛主义的传说》，《中国季刊》第1号，第76、73页。1967年，费正清在自己60岁生日之际，写了一首幽默的打油诗，“招供”了这个“阴谋”，其打油诗是这样结尾的：这些文献，一经检查，就会证明所谓的“费正清”就是个传销团伙 (syndicate) 谁在忙着用另类的方式撰写备忘录那正是早期阶段的本杰明·史华慈。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2: 448. (中译本为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阎亚婷、熊文霞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341页。)

③ 魏特夫 《北京的“独立”》，《新领袖》，1959年7月20-27日，第13页。

④ 魏特夫 《毛主义的传说》，《中国季刊》第1号，第75页。

⑤ 魏特夫 《魏特夫复史华慈》，《中国季刊》第2号，第28-29页。

⑥ 魏特夫 《北京的“独立”》，《新领袖》，1959年7月20-27日，第17页。

在魏特夫的描述中，“毛主义”造成的危险已经远远超出了象牙塔，但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本质上还是学术性的。“据说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在伊顿公学的操场上取得的。今天，学者和意见制定者所持的观点对决策者将做出的决定同样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在当前的冷战中，决定胜负的学派、大学、基金会和研究中心都在哪里？”<sup>①</sup>

魏特夫建议，要由充满正确政治观点的公共知识分子来填补这一空缺。

既然哈佛学派涉嫌编造了一篇危险的“‘毛主义’的论文”，那么，另一个学术机构就会生产解药。值得庆幸的是，由于魏特夫和他的“冷战”同事们（乔治·泰勒 [George Taylor]、弗朗茨·迈克尔 [Franz Michael]、唐纳德·特德戈尔德 [Donald Treadgold] 等人）的学术努力，这样的纠偏补救的措施唾手可得。他们聚集在华盛顿大学新成立的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魏特夫声称自己代表该组织发言“必须澄清事实，这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而且有一小部分但却有越来越多的远东专家正在这样做。对中国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根源进行真实的比较研究是不可能的。这样的研究将开启我们清除对当下中国和苏联政权之性质和意图的广泛误解。”<sup>②</sup> 在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的学者们发表的众多的著作中，魏特夫无疑首先想到的是他自己即将出版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一项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sup>③</sup>。魏特夫的研究将中国和俄罗斯同构化的起源归因于两国社会古老的国家统治传统。

鉴于他自己和其同事所受到的火力密集的激烈抨击，一向冷静沉稳的本杰明·史华慈被激怒了，他以一篇题为“‘毛主义传说’的传说”的尖锐反驳予以回击。他写道，“多年来，魏特夫教授一直痴迷于一种观点，即费正清、史华慈和布兰特（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犯下了一个‘错误’（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这一‘错误’使得我们在与世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导致了不可估量的邪恶后果。”<sup>④</sup>

史华慈拒绝接受“魏特夫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概念，魏氏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全面革命的学说和策略’，是一门现成的权力科学，是一个可以应对任何情况的既成方法，即它是一门永远不会对众多新生和偶发事件感到惊讶的科学”<sup>⑤</sup>。史华慈提醒读者，他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之首要目标，是一直在跟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被毛泽东领导，为毛主义成为在中共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战略和政策创造条件的实际过程。毛主义隐含着的背离（如果不一定是在承认意识形态教义方面，但是在实践方面）正在，而且，持续地展开：“这一故事的结局 [至今] 仍未一目了然。”<sup>⑥</sup>

史华慈坦然承认，在试图解释中国共产主义不透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都犯了错误”，但他强调，自己的毛主义概念来源于努力理解毛泽东及其同志们的鲜活的实践经验，他们为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革命策略，其摸索过程时断时续，随机调适。因此，史

① 魏特夫 《北京的“独立”》，《新领袖》，1959年7月20-27日，第17页。

② 魏特夫 《北京的“独立”》，《新领袖》，1959年7月20-27日，第17页。

③ 魏特夫 《东方专制主义：一项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57年。

④ 史华慈 《关于“‘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中国季刊》第2号，第35页。

⑤ 史华慈 《关于“‘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中国季刊》第2号，第36页。

⑥ 史华慈 《关于“‘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中国季刊》第2号，第36页。

华慈的经验方法与魏特夫之预先设定理论的学术模式在根本上截然不同，后者的正确性据说存在于对马列主义学说的所谓权威把握中。史华慈呼吁魏特夫丢弃其自恃甚高的优越情结，而采取一种不那么僵化的研究进路“因其特殊经历和特定‘理论’所赐予的、除了自己独占以外，我们这些其余的人都无能享有的理解共产主义的某些特权，其实只是一种幻觉，克服这种拥有特权的优越幻觉，事实上对魏特夫教授来说才是当务之急。”<sup>①</sup>

发表于 70 余年前的本杰明·史华慈关于毛主义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理解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研究中国的学术方法，都引发了令人瞩目的共鸣。有一种观点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没能超越毛泽东思想，也没超越经典的马列主义。史华慈理据充分的动态[灵活流变]意识形态概念（作为一种由与众不同之党的领导人（the part of individual leaders）所做出的，并对后续政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践策略的表述），对上述观点是一个有用的纠偏。习近平本人认为他的观点，就建基于毛泽东思想之“实事求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群众路线”（平民主义，populism）和“独立自主”（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三个核心概念之上。这些核心概念又被重新目标化，以应对当下的挑战。这一建构的明显动机是为了避免在其眼中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致命失误，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当代中共最高领导人特别像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既然已从苏联原型中脱离出来，就只能竭力在中共自身的关键教训中总结经验。本杰明·史华慈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面，他意识到共产党领导人不一定比其他政治人物更受正统教条的约束。但是，他坚持认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言辞（utterances）无足轻重；恰恰相反，他们的演讲和著作为其政治策略的起源和长远影响提供了关键性洞见。

在史华慈看来，问题不在于毛泽东理论上的偏离与革新，而在于一位业已取得多项具体政治业绩（accomplishments）的党的领导人提倡关于意识形态独创性的要求，这才是最终至关重要的核心要害，正是基于这一点，才使毛泽东有足够的自信去寻求他及其他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正如史华慈 1965 年就观察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之意识形态独立性的断言，最先在延安得到清晰的展现，而在 1956 年之后，随着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和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运动，中国自身逐渐加速脱离了苏联的轨道，取而代之的则是其宣称的另一种“毛主义愿景。”<sup>②</sup> 麦克法夸尔将 1956 至 1957 的事件描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主要的转折点”，毛泽东倡导的“国内外新的战斗性”，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sup>③</sup>

史华慈 1956 年关于“毛主义愿景”的特征描述，很容易地被写进 60 年后的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这一愿景不仅涉及未来良好社会的概念，而且还涉及实现这一愿景之方法的神圣形象。当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是这一愿景的主要来源之

① 史华慈 《关于“‘毛主义’传说”的传说》，《中国季刊》第 2 号，第 42 页。

② 史华慈 《共产主义与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8 年，第 171 及其紧接其后是数页。

③ 麦克法夸尔 《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 年，第 317 页。

一，但这并不排除它在若干方面与中国的某些传统思想和行为习惯相吻合的可能性。<sup>①</sup>

中共十九大报告强调“我们完全有信心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色，为人类政治进步作出中国贡献。”中共最高领导人直接从毛泽东在“百花齐放”时期的历史文本中提取了其集中全力于他所认定的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国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sup>②</sup> 将2035年定为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期限，为实现这一未来愿景提供了一个熟悉的公式：坚持党的领导。

设法探寻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之重要性是一个持久弥坚的过程，然而，直到最近，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场域才提供了少有的路标。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识形态重新确立了明确主导地位 and 全球雄心，学者们对此不能再视而不见了；从习近平“中国梦”的思想表述，到他最新关于“新时代构想”，宣传和普及最高领导人的“宏大愿景”（“visionary”），思想规划再次占据了中国共产党议程上的制高点。<sup>③</sup> 党把这种全面的意识形态努力放在首位。

与毛泽东一样，习近平把他的愿景描绘成中国革命传统的延续。在2020年的新年贺词中，他追溯红军长征的路线，从中挖掘“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不竭动力”。也像毛泽东一样，习近平还强调要密切联系农民“像往常一样，不管多忙，我都要花时间看望乡亲们。”<sup>④</sup> 习近平与毛泽东的共同取向则是，昭示着一种具有广泛应用之发展模式的中国经验。尤其在全球新冠病毒危机的阴影下，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称赞中国的“新发展范式”是瘟疫以后全球复苏的灵丹妙药。<sup>⑤</sup> 共产主义政党倾向于把其意识形态描绘成未来行动的蓝图，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研究表明，把它看作过去和现在经验的总合则更加有用“每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谱系都表明，它是一种生物，不是先于政治活动的预先谋划（premeditation），而是对某种政治方式的静默沉思（meditation）。总之，首先是政治活动，然后才是政治意识形态。”<sup>⑥</sup> 正如本杰明·史华慈从经验中领悟到的那样，当中共聚焦于其最高领导人之“宏大愿景”（“visionary”）的思想时，就表明了其判定（deem）的业已得到验证的实际政治理论之权威大纲，正在出场。

史华慈的工作所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毛主义的遗产，而且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研究方法。他反对把制造真理的宣称建立在固守理论正统的基础上，他对于这种教条主义思维模式（mindset）所提出的告诫，是极其值得铭记的。如果说今天罕有学者试图采取

---

① 参见史华慈《共产主义与中国：流变中的意识形态》，第171-172页；克里斯·巴克利（Chris Buckley）：《中国高举“习近平思想”，将领袖提升到毛的地位》，《纽约时报》2017年10月24日。

② [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7-10-18/60018047\\_all.html](http://news.dwnews.com/china/news/2017-10-18/60018047_all.html)；关于“矛盾”在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核心作用，见弗朗茨·舒尔曼（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组织》，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章。

③ 参见裴宜理《中国民主的民粹主义梦》，《亚洲研究杂志》第74卷，第1期；陈诚《意识形态的回归：后共产主义俄罗斯和中国对政权身份的探索》，密歇根州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16年；曾景汉《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意识形态、合法性与政党凝聚力》，纽约：帕尔格雷夫出版社，2016年。

④ 详见习近平主席2020年新年贺词全文。

⑤ 详见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

⑥ 迈克尔·奥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62年，第118-119页。

“削足适履”的方式，把他们的分析强塞进马列主义理论这只“旧鞋”里（“the old procrustean bed”），<sup>①</sup>那么，其他的理论束缚则是随处可见。从理性选择理论的一端到后现代理论的另一端，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专业者都是基于某种既定的理论权威，而不是鲜活的研究发现来推进自己的论点。史华慈的学术研究肯定不是非理论的（atheoretical），这一点确定无疑，然而，就像毛主义自身那样，史氏的理论来源于实证调查。毛泽东曾把中国革命比作“草鞋”，他引用湖南谚语“草鞋莫（无）样，边打边像”。意思是说，中国革命事先没有固定的模式，只能“在制作中塑造自己”<sup>②</sup>。本杰明·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所采用的正是类似于这种开放式与回应式（open-ended and responsive）的方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但是中国共产党仍要自觉地回顾自己过往艰苦卓绝的历史篇章。一条“不忘初心”的醒目横幅悬挂在人民大会堂的后墙上。不错，中国共产党对历史连续性的强调往往具有高度的策划性（contrived），尽管如此，党对革命和文化道统（lineage）的认定，仍然是其同一性（identity）的核心。习近平本人经常征引“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格言，并把这一短语与毛泽东遗产联系在一起。在十九大的开幕式上，他呼吁代表们默哀，以纪念毛主席和其他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贡献。在这个“新时代”来临之际，我们也可以从那些我们研究过的历史和政治人物那里得到启示，去回顾我们自己之智识先贤（intellectual ancestors）所取得的思想成就。

## Debating Maoism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flections on Benjamin I. Schwartz, *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

Elizabeth J. Perry Translated by Xiao Yanzhong

**Abstract:** Xi Jinping's frequent references to Mao Zedong, along with Xi's own claims to ideological originality, have fueled debate 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Maoism in the PRC today. The discussion recalls an earlier debate, at the height of the Cold War, over the meaning of Maoism itself. This paper revisits that earlier controversy, reflected in arguments between Benjamin Schwartz and Karl Wittfogel, with an eye toward thei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Keywords:** Maoism; Xi Jinping; Benjamin Schwartz; Karl Wittfogel; ideology

（责任编辑：帅倩 张叶婷）

---

<sup>①</sup> 此处作者使用的是“普罗克鲁斯蒂之旧床”的比喻。其典故出自希腊神话，故事大致是：妖怪普罗克鲁斯蒂把他床作为标准，要求过往与床之大小正相符合。客人利用他的来杀死，如果高个子，就砍掉其腿或脚；如果旅客是个矮个子，就把其生生拉长。此处采取适合于中国读者“成语置换”的意译方式。

<sup>②</sup> 参见毛泽东《在最高国家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28日），转引自约翰·布莱恩·斯塔尔《继续革命：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9页。